

你的社区，我的工作，他的DQ——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失业记

经历区议员助理工作的常规和例外，他的地区劳动琐碎、有意义且与时代共振，直到为新时代不容。



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阿明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文：Ming Wong 策划：艾迪

刊登于 2024-01-27

[#区议员助理](#) [#区议会选举](#) [#返工这回事](#) [#非建制派](#) [#区议员](#) [#民主派](#) [#反修例运动](#) [#香港](#) [#职业](#)



【编者按】“其实你返工有咩做㗎？”——这个问题，你有问过别人或被人问起吗？

这个来自日常的问题，启发我们开启“返工这回事”这个新栏目。在当代社会，工作主宰我们的生活，既定义个人的身份，亦维系社会的“正常”运转，但在“隔行如隔山”的区隔中，我们并不容易看见彼此——从恒常的工作劳动，到行业内的语言词汇、职场文化、人际关系、性别分工、权力层级以至价值体系。借此栏目，我们希望打破边界，深入聆听多位“打工仔”的行业见闻，不但走进社会各行业的“贴地”日常，亦从职业的视角观照当代社会的切面和现象。

踏入2024年，香港新一届区议员走马上任。政府改制后的首届区议会，无论是深耕社区的资深区议员，还是2019年冒起的素人区议员，只要不属建制阵营都“入闸”无门，全面清零。他们既失去服务居民的机会，也面对实在的失业问题。同样失业的，还有数十名历经2021年宣誓风波和辞职潮的剩余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。这期“返工这回事”访问非建制派区议员助理阿明（化名），过去10年他先后担任5位区议员的助理，曾在常规下工作，也亲历反修例运动后的区议会例外时刻。从他的视角出发，我们将看到地区工作者亲历的大事小事烦心事，也看到政治浪潮如何与社区共振。

粉碎纸张、收拾办公室、点算归还政府的物资，并和街坊好好说再见，在议员助理生涯的最后一个月，阿明忙中带闲，迎接这场预先张扬的失业。

“一定不舍得，某程度象征地区工作生涯的完结。”阿明这段日子百感交集，不舍得和各位街坊的情谊和连结，同时感到迷惘，不知道之后找什么工作。

十年前，阿明在中学毕业后便兼职区议员助理，“当时要找工作，顺便自己又想学一下地区的東西，就这样入行了。”后来，他在2013至2023期间，断断续续待过五位区议员的办公室，既当过民主派大区议员的助手，也做过无党派素人区议员的助理，服务过港岛公屋社区，也扎根于新界新市镇。

作为助理，他分担区议员的“常规工作”，是居民的填表员、恶邻的调解员和地区事务的杂务员。而在后2019年区议会的“例外时刻”，他与区议员上司亦参与政策倡议和政治异议，目睹不少“异想天开”的区议会活动。

这份工作琐碎、有意义且与时代共振，直到为新时代不容。



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阿明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地区求助站

“维持办事处开放已经是一个工作。”

从星期一到五，朝九晚六，有时收晚一两小时，阿明的主要工作是维持议员办公室“门常开”：听电话、收信件、协助居民。阿明说，自己和区议员上司的工作有很大部分重叠，彼此也是“战友”的关系，只是要分担更多的杂务。

在公屋区，议办是不少居民聚脚点，他们会过来打趸吹水（流连聊天）。阿明常常做官民之间的第一接触点——既提供官方资讯，也帮街坊填表和出信。

表格何其多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填，尤其是区内的老人家。公屋申请或调迁表、消费券、长者生活津贴、高龄津贴（生果金）、乐悠咭（长者2元乘车优惠八达通）和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（低津）都是阿明经常帮忙填写的表格。

“全宇宙最烦的一定是低津。它要将全家人半年的工资计算一次，然后还要再写一大堆资料，每一个家人都要交身份证副本；然后又要计他工时多少，是否符合资格拿低津，这是很时间的过程。然后九成情况是，资料都是不齐全的，第一次资料一定不会齐，因为太多东西填了。”

对阿明来说，填写社会福利表格还是应有之义，但有一些填表工作他则想婉拒，像申请回乡证、中港通关后的健康码、安装“安心出行”。“那些老人家真是不懂的，因为都不用电话，怎会无端懂得填那个健康码。我有时很想拒绝，不过算了。”

社会福利大排长龙，有时居民寄望区议员在填表之外，还会帮忙写信给政府部门，加快进度。像公屋调迁，有住户因医疗需要（如坐轮椅），希望搬到大一点的单位，也有住户因家庭成员人数增加，一家八口太拥挤想分户出去。阿明说，区议员或有机会促使房委会加快调迁，但这不是区议员正式的权力，而区议会的信件也越来越无用。

“起码以前他们会看，但现在他们就直接说不会处理，只会看社工和医院的。”



2022年1月13日，大围一个小型美化工程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渗水

活在香港，生活多烦恼。假如遇到家居渗水、噪音和鼠患问题，烦恼倍增。阿明坦言，区议员有时接到这些求助，也常常爱莫能助。

渗水往往由水管老化、欠保养造成，严重者可致滴水，石屎（混凝土）剥落，钢筋暴露。阿明说，按程序渗水问题通常要通知大厦管理公司，然后“报案”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渗水办事处，而居民找区议员“只是加一点压力”。

“管理公司就很复杂，我都不明白为何同一栋公屋大厦可以分为租和买，楼上是买的楼下是租的，然后有两间管理公司。”（编按：政府于1991年推出租者置其屋计划，让指定屋邨公屋租户可以购买居住中的单位）

待报案后，职员就上门调查，并邀请楼上住户做色水测试，看看渗水源头是否在此——这还是顺利的情况，阿明指多数情况住户都不会让职员入屋，要出很多封信，弄很久食环署才可跟法庭申请手令，要求住户开门。

在这个等待过程中，水照渗、石屎照跌，住户心烦，实在等不及便自掏腰包找公证行检验，希望有更大的议价能力，再循小额钱债审裁处追讨。

“住户大部分情况第一时间都找保安，但有时管理公司被认为放软手脚，处理不好，居民才找区议员，觉得可直接和管理公司和政府交手。”

与渗水一样，噪音问题同样困扰不少居民。阿明说，有些噪音问题牵涉室外环境，如马路的水渠盖装得不好，车辆驶过就有声响，但更常见的是邻里之间的互相投诉。“我最近就听到街坊投诉人家做饭太大声，剁肉饼之类的，但那是合理的做饭时间，又不是凌晨两三点切肉饼。”

阿明说，噪音管制条例只规管晚上十一点后，很多时也阻止不了其他人制造声响。“你上去的话，什么噪音都没有了。有一天你被人拍门，你也不会继续制造噪音嘛。”有一次，阿明的区议员办公室、管理公司和几层住户都听到噪音，但最后不了了之，因为很难确切查到是谁制造噪音。

“说真的，我们有什么权力呢？最多是尝试协助双方自行处理和调节。如果他们各执一词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在社区中，区议员除了兼顾人的问题，还常常要处理鼠患。阿明曾待过一个社区，街市有大量老鼠，居民夜晚一下巴士就见到老鼠巡游大叫。阿明和区议员上司联络管理处和食环署商讨治鼠方法，尴尬的是街市只出动老鼠笼，里面的食物是薯仔，“老鼠也不是傻的”，薯仔远远不够街市的肉汁、血水和湿货吸引。

“问题是这个街市不是公营街市，而是私人街市，食环署只能提意见，不能强行清洁。”阿明说，最重要的是业主立案法团和管理公司，如果他们不做事，区议员也没有办法。

荃湾区议会曾耗费七十万元兴建的一座巨大鹅形雕塑，用意凸显“深井烧鹅”的特色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尽管如此，阿明说当时的区议会仍有触碰一些始料不及的关键问题。“现在回看都觉得几好笑，譬如我们关心三会委任，怎料到现在三会这么重要。那时候说希望有三会界别的划分、委员的名单、会议的报告、联络方法等。”

所谓“三会”，指的是“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”、“地区防火委员会”和“分区委员会”，成员均由政府委任，当中不乏区议员、地区人士，绝大部分为建制派。在2023年区议会选举，任何区议会直选界别参选人皆需取得每会各3名委员提名，但政府拒绝公开“三会”联络，引起争议。

阿明指，当时的区议会亦创造空间，推进以前少人关注的社会议题。在2020年7月，葵青区议会通过拨款，预留20万元作性教育活动。另外，有区议会也讨论社区的单车政策和回收等问题，不少议办更设有回收箱供居民使用；有些区议会则探讨儿童议会，希望将儿童及青少年的声音带进区议会。有见于社区缺乏正式的公共表达空间，有些区议会也提倡成立社区民主墙。

在2020年的香港同志游行，除离岛区外，17区区议会亦通过成为支持机构。不过，游行最后受到警方以疫情为由的反对通知书，改在网上举行。

在推进新议题的同时，阿明说，很多区议员见到旧有的建制活动就否决，尤其是“社区参与计划”中多项庆七一回归和十一国庆的活动拨款。另外，在2020年6月初，17区区议会举行特别会议，通过议案要求撤回港区国安法。

其后，这种区议会的新局面被政府控制。随著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和2021年宣誓风波和离职潮，无论是区议会还是市民的社区参与都归于沉寂。

2019年7月6日，“光复屯门公园”行动，一名疑似歌舞团的表演者遭示威者围骂，期间双方互相向对方泼液体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价值冲突：性工作和卖唱

区议员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，在阿明的工作生涯中，也遇到居民的需要和想法与自己有冲突。

有一次，有居民投诉当区有“流莺”（性工作者），引来很多男人，觉得大厦很危险。阿明不认为性工作是问题，“其实我有点生气，但我很礼貌地跟她说：其实香港性工作是合法的，一楼一是合法经营的。”阿明自言做不了什么，只好这样回应居民。

另一次价值张力则关于卖唱。自2019年夏天，有表演者（通常被称为“大妈”）被指在屯门公园大声卖唱，行为不雅，居民不满，到场抗议康文署放任噪音滋扰，并要求禁止行乞、不雅之活动。阿明在2020年初，便需要陪同区议员到场监察。

有一日，表演者和示威者爆发激烈口角，场面混乱，一罐黑啤差点扔中阿明。本身也曾在公共场所表演的阿明坦言，自己内心纠结，“我觉得人们卖唱是没问题的，但就接受不到两边这么冲动地碰撞。不过是两难的，那时候真的有点过份，因为屯门公园好像被‘大妈’霸占了。”“问题是怎样商议如何使用公园空间，但很可惜没有这个机会，因为两边都争持不下。”

在压力之下，政府最终修订《游乐场规例》，加强管制公园内的噪音滋扰。讽刺的是，后来阿明在其他公共空间街头表演，警察引用同一条法例警告，使其知难而退，结束表演。

“非建制派”区议员助理阿明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失业、人才荒

回过头来，阿明工作中的价值冲突已经算是happy problem。随著政府大幅收紧区议员参选资格，阿明的区议员上司没有寻求连任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民主派区议员能入闸参选——阿明的地区工作生涯等同被DQ了（Disqualify，取消资格）。

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阿明有时想赚钱、有时想学习、有时作为政治参与而做区议员助理。在年少气盛时，阿明直言很难不去想“与其花这么多时间做区，不如去示威游行更好”，但后来慢慢明白，人家也忙也要上班，社区工作还是有价值。

不过，无论多么雄心壮志，阿明说地区工作很多时也“爱莫能助”，“说真的整个大政策都改变不了，其实都不能带来什么影响。区议员只是一个很小的齿轮，推动不了整个东西。”

在政府改制后，再三强调区议会属“非政权性的区域咨询和服务组织”，并改由民政专员任区议会主席，使其等同行政机构的延伸。在阿明看来，“区议会从来都是咨询架构，没话事权，当然立法会都是，都是被阉割的畸形架构。”

“（政府）好一点才理你，不好可以不理你。”阿明说。

迈进2024年，阿明正式失业。在香港市道低迷的时候还没找到工作，他也成为整个民主派区议员和其助理失业大军的一员。以他理解，类似背景的区议员和助理转投各行各业，有些也离开香港。

回望这十年的工作经验，阿明感到可惜，但不觉浪费青春，因为这是一段珍贵的人生经历。尽管不能做回本行，但阿明相信自己累积的经验、学到的与人相处技巧可以转化到人生的下个阶段。

另一边厢，据报建制派新丁区议员助理人才供不应求，尤其是间选、委任议员。

“哪有这么多熟手员工？以前反对派辞职后遗留下来的，大家又可能怕‘出事’未必敢请。”有候任建制派议员在上述报道说道。

而阿明，并没想过转投建制。

区议员办事处正在执拾中的物资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[# 区议员助理](#) [# 区议会选举](#) [# 返工这回事](#) [# 非建制派](#) [# 区议员](#) [# 民主派](#) [# 反修例运动](#) [# 香港](#) [# 职业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[點擊了解更多會員計畫](#)